· 论点摘编 ·

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宋代出版传播方式的变革

清 飏

宋代是书籍传播由写本向印本全面转化的时期。隋末唐初,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不仅改变了文字媒介的生产方式,使书籍得以大量生产,文字媒介得以更快、更迅疾地进入传播渠道,宋代的邸报、书籍等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还使得纸质媒介的生产成为一项社会事业,出版传播业由此产生,并使得编辑工作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编辑活动成为人类传播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中界和守门人。这一切对人类传播事业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雕版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①。雕版印刷虽是我国隋唐以来的一大发明,但真正享受这一成果的却是宋人。总的来说,唐代还是写本书的时代,雕版印刷物大多为佛像、佛经和日历。现存最古的印本历书为唐乾符四年(877)的历本残片。历书的字数虽少,而民间需求颇大,是最适合于批量复制的印刷出版物,因而,成为唐人使用最为广泛的印本媒介。一般书籍如数书、小学等的印刷物,在唐代虽已出现①,但并未成为当时流行的纸质文字媒介。何况,当时印刷技术尚未成熟,正如唐代柳玭在《忠训·序》中所言,"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存在字迹漫漶,模糊不清的状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印本书籍的传播,尤其是儒家经典的制作是十分郑重的,不容墨影漫漶的现象出现。

(一) 五代是书籍传播由写本向印本转化的过渡时期,而在文字媒介的发展史上又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

印刷术经隋唐的实践与发展已有较大的提高,作为文字媒介的实际应用也更为广泛,一个明显的标志即是政府刊刻《监本九经》。五代后蜀政权的纸质媒介除抄本外,虽仍有在石碑上刻经供人传拓,将每个拓片黏连后制成卷轴作为儒家经典标准读本的状况,但这些经严格检校刊勒上石的刻石经的传播举动,颇类似于唐代乃至东汉蔡邕刻石碑于太学的方法,是一种传统的、能保证所含信息准确地、真实地、无差错地复制的传播手段,但它的复制量毕竟太少,且石经字体大,拓本制成的卷轴也较大,每拓传播的信息量也少,传播极为不便,因而,这种传播方式只用于政府极为重视的经籍的传播。在五代,除了采用这种传统而古老的拓片传播方式外,后蜀政府开始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复制经典标准本的方法——雕版印刷。据《五代会要》载,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奏请政府刊刻九经,"尝见吴蜀之人,鬻印版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较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朝廷遂"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匠人,各部随帙,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需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同上)。正是基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大众传播工具之一的雕印经书才正式出现。这些儒家经典的印版书依《开成石经》为底本校刻,由国子监主持其事,有专门的校刻者马缟、陈欢、段颙、田敏等人参与,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历时二十多年才全部印完,称《监本九经》,书版藏国子监。总之,雕版印刷这一纸质媒介制作方式的产生,适应了日益发展的社会传播的需要,也使朝廷得以刊行经过仔细看读、校核严谨、利于传播的标准经籍读本,杜绝了粗制滥造、"杂本交错"的经籍在传播中的信息误导,从而让"所印敕本"得以"广颁天下"、"深益文教"并"雕摹流行",有利于统治者维护其统治。这是儒家经典的第一次雕印,也是政府刊刻的第一批官版书,从中可见,五代时不仅民间"印版文字"相当流行,且"色类绝多",连官方也刊刻了《监本九经》这样重要的经籍。不仅后唐如此,据《资治通鉴》卷二七一后蜀广顺三年条记载,后蜀宰相毋昭裔也"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他在成都雇工雕印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贴》,这对后来的私人印书传播有较大影响。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五代时,传播物的书写人与雕刻人已分开成两道工序,据《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长兴

① 参宋代朱翌《猗觉寮案纪》卷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王应麟《困学纪闻·经说篇》引《国史艺文志》语"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数术、小学"。

三年四月的敕文“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可见,当时已有刻工与书写人的不同分工,这无疑保证了印本书的质量。国子监雕印的经书选用的是国家规定的标准读本,书写手为名家,又请专人精工雕刻,克服了唐代刻工书写印本书易漫漶不清的缺点,从而为宋代出版传播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金戈铁马的乱世五代,在印刷传播史上却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承先启后的时代。可以说,正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孕育和促成了印刷术的发明,而印刷术的发明,又促进和推动了传播事业的发展。

(二) 宋代是印刷传播大发展的时期

宋朝统一中国后,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也得到了更高的发展,繁荣的经济,又推动了文化事业的昌盛。当时人们的文化活动日益频繁,社会联系更为广泛,以雕版印刷为手段的传播事业也进入了空前昌盛的时期。

宋代不仅有空前的中央政府以雕版编印书籍的活动,地方政府、民间的、坊间的雕版编印活动也层出不穷,更有当代人的作品刻印成书,广为流传①。这些印本书的普及,与印刷术的发明息息相关,当时的河南、四川、福建、浙江成为印刷传播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而汴梁、临安、婺州、苏州等地也成为刻书传播的中心。刻写传播的内容则遍及经书、史书、子书、医书、算术、文集等各个领域,创下无数印版发行的第一,出书总数接近历代出书总数的一半,可谓前无古人。

(三) 活字印刷术的特点及其滞后现象的思考

宋代雕版印刷术对媒体制作的强力冲击,为抄本传播的作业方式、观念和书籍市场带来了新的变革和重组,同时,也催生了传统的雕版印刷出版业的产生。雕版印刷业在宋代的盛行,对书籍的传播、收藏、翻印无疑带来极大便利。但它仍有其固有的缺陷:版本笨重,堆积如山,不易保管,刻写又费时费力,刻后开印一两次后也就难以再用,弃之可惜,藏之又占地方。宋代文献中就有不少专门制版的印版库之记载。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图书的传播及印刷媒体业的进步,无疑是一大碍。适应宋代文化发展的需要,比雕版印刷术更为先进的活字印刷,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得以发明,作为近代印刷术的先驱,它为人类大众传播的行为贯注了一条全新的命脉,成为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中,最早记载了这一享誉世界的中国四大发明之一:

>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岭,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次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岭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

上述记载使我们对于活字用于印刷传播的特点有如下几点认知:其一,灵活小巧,以简驭繁,字平如砥,方便实用;其二,印时排版,用后拆版,每字多用,用后不弃,以韵为序,木格贮之,简易高效;其三,印制方便,印数愈多,愈益神速;其四,一版印刷,一版布字,交叉进行,“更互用之,瞬息可就”。这无疑是极具现代印刷术特点的高效率的媒体生产方式。范祖禹的《帝学》就是用活字印刷术印制并流传下来的书籍。南宋时周必大也曾用胶活字印过自己的《玉堂杂记》,他在给程元成的信中说:

> 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愿台览。尚有十数事,挨追记补缀续纳,窃计过目念旧,未免太息岁月之云云也。②

缪艺风《艺风藏书续记》卷二,即著录了其所藏的这部用木活字印刷的书。书后的印书缘起中,写明为南宋嘉定辛巳(1221)季夏望日,青社齐砺书。可见,印刷术对传媒的冲击及印刷传播业的影响是颇大的。

---

① 有关论述,参见徐枫《论宋代文学的编辑出版与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② 参见《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九八六《书稿》卷一三《程元成给事》。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麦克·哈特在世纪末的一本书中，对影响人类历史的 100 位人物排位时，将造纸术发明者蔡伦排在第七位，而将古登堡排在第八位，却完全忽略了毕昇发明的作用，这无疑是有失公允的。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毕昇的发明比德国的古登堡早四百多年，但在宋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并没有得到传媒业的广泛使用，欧洲的活字印刷也并非从中国所学，而中国的现代印刷技术却来自欧洲，原始的雕版印刷业在中国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用雕版印刷制就的传播物，一直是宋代数量广泛的、传统的信息传播工具，这种长期的停滞状况，直到元明之际才得以改变。活字印刷术这一古老的四大发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使用前景上，都是颇有价值的伟大的发明，但在宋代及以后却没有导致传播业革命性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出版传播的角度看，一方面，由于一项新的传播技术的发明往往要有成熟与发展期，泥活字印刷在北宋初尚未成熟，应用上还存在不少困难；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这当与宋代的文化发展水平及传播物的要求尚未达到急需活字印刷术的状况有关。泥活字“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反而是雕版印刷旋写旋刻，不必一一找字、布字，显得更方便些。况且，宋代传播量大的多为一些诗、词、小文或历书等，这些传播物往往篇幅短小，刻写方便，版印销售也很容易，而大部头的宏篇巨制印制数量并不多，如北宋初年规模空前的“类书之冠”《太平御览》凡千卷，当时的印制数就不会很多，市场上也没有这样大的需求量。同样，《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神医普救》也皆为千卷本，且字数繁多，如《册府元龟》字数就接近一千万字，像这类书若印“数十百千”本，尚能神速，否则，就难以体现活字印刷的优越性了。可见，传播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传播环境，社会对传播物的需求状况也是影响传播技术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论点摘编·

宋代笔记小说的词学价值

李剑亮

笔记小说作为小说之一种，其性质“介于文史之间”（参见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第 107 页），它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还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宋代笔记小说是在唐代笔记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又受着宋词繁荣局面的影响，其中有不少文字是关于词学研究内容的，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词学价值。

对宋代笔记小说的词学价值，前辈学者曾予以重视并利用。如唐圭璋先生在编撰《全宋词》时，“辑佚的渊薮”中便包括了“笔记小说”（参见《全宋词》编订说明）。当然，宋代笔记小说的词学价值不囿于此。它还表现为三个方面，即：（一）词人评骘；（二）词作鉴赏；（三）词学文献考辨。

（一）词人评骘

宋代笔记小说对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词人多有记载，或记其生平事迹，或述其创作原委。如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即记载了南宋吴感的有关情况：“吴感，字应之，以文章知名。天圣二年（1024），省试为第一。又中天圣九年（1031）书判拔萃科，仕致殿中丞。居小市桥，有侍姬曰红梅，因以名其阁。”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笔记小说在介绍词人身世遭遇、仕宦交游时，往往与其创作经历结合起来，从而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来评价词人。如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二曰：“昔我先人鲁公遭遇圣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每区区其间，有毛滂泽民者，有时名，上一词甚伟丽，而骤得进用。大观中有赵企企道者，以长短句显，如曰‘满怀离恨，付与落花啼鸟’。人多称道之，遂用为显官，俾以应制。”据此可知，毛滂之作词与其仕途之得意，有着一种因果的关系。

（二）词作鉴赏

对宋词作品进行鉴赏，是宋代笔记小说的又一特色。其鉴赏的性质有三：一是品鉴文情辞采。如袁文《瓮牖闲评》卷五曰：“黄太史词云：一杯春露莫留残，与郎扶玉山。’又词云：杯行到手更留残’。两‘残’字下得虽险，而意